

世变中的史学

李金强 主编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世变中的史学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变中的史学/李金强等著.

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-7-5633-9246-9

I. 世… II. 李… III. 史学—中国—20 世纪—文集

IV. K092.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076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www. bbtpress. com)

出 版 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5mm×670mm 1/16

印张:23.25 字数:300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导 言

20 世纪中国新史学的起承转合

20 世纪中国史学，由于西学东渐而出现丕变。其中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所撰《新史学》（1902）即为中国史学变革吹响号角。此后，我国史学即在吸纳西学，求变、求新的历程中累积，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中具有相当成绩的一门。顾颉刚（1893—1980）早于 1947 年出版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，初步总结及评估其成绩。他指出 20 世纪中国史学始由西方科学治史新方法，历史进化新观念以及本国新史料的出现导致新成果的产生。^{〔1〕}其中最值得注意者为北京大学由胡适（1891—1962）、顾颉刚以至傅斯年（1896—1950），上承清代乾嘉考证，步继德国兰克（Leopold von Ranke, 1795—1886）史学，起而倡导以科学治史，揭橥史料即史学，从而触动古史研究高潮——疑古之古史辨运动，继而创设历史语言研究所，开展“新学术之路”，是为 20 世纪史料学派的诞生。^{〔2〕}

及至 1949 年，我国史学由于国变，从此出现两岸三地——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的分途发展，其中最重要莫过于中国大陆的史学变革。原生于 20 年代中国在革命时局下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，基于革命的需要，群起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进程，借以为中国革命合理化提供历史依据；引发争论，是为史观学派的源起。建国后以马列为治国之本，史学界遂再引入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，对中国自古

〔1〕 顾颉刚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，南京：胜利出版公司，1947 年，第 2—3 页。

〔2〕 参《新学术之路》，台北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97 年。

至今的历史进程，重新阐释，由是牵动史学革命。并由“以论带史”的治史特长，演变而成文革时期的“影射史学”，史学遂与政治现实馆合，不惜为政治目的而扭曲史实，出现“史学危机的呼声”。直至1979年改革与开放后，史学始重见学术的曙光，史学研究恢复独立与自主，因应既有传统，进而吸取台湾、香港华文史学的成果，从而进入西方史学研究的“新天地”，国内史学界犹如春天再临，渐见新局。〔3〕

至于台湾，除日治时期帝国大学（台湾大学前身）之日人殖民史学昙花一现外，自1949年以降，以北京大学及中央大学（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演变而至）为主的“北大南高”史学，东移“宝岛”。其中出身北大及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（史语所）的傅斯年出掌台湾大学，以及促成史语所在台复所，民国时期史科学派成为迁台后台湾史学的主流，而以《大陆杂志》为其时史学研究的表征。与此同时，出身南高之郭廷以（1904—1975），至台湾师范大学任教，并于1955年创设近代史研究所（近史所）于中研院，上承南高尊重本国传统，兼摄西方文化的特质，起而推动中国近代、现代史研究，另辟天地。〔4〕至此北大、南高之史学在台双峰并峙，而前此对民国史学重北大而轻南高，理应重估。至1971年，中国社会史论战主将之一的陶希圣（1899—1988），于台复刊30年代停刊的著名社会经济史期刊——《食货半月刊》，是为新《食货月刊》，此份号称为“中国历史社会科学杂志”，在冷战时期台湾亲美的政治形势下，大量引进美国行为及社会科学治史之理念，促使台湾史学研究由重视史料史实重建进而主张释史之必要性。而其后继者为创刊于1979年之《史学评论》及1990年之《新史学》两份史学专业期刊。即为向西取经，以西法治史此一研究风气及学术路向之延续。从而促成台湾史学界的心理史学、计量史学、社会经济史以至新文化史研究的相继出现。台湾之史学，

〔3〕 参肖黎主编：《中国历史学四十年 1949—1989》，北京：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9年；并参肖书内王戎笙《台湾地区史学》一文，第606页，王氏指出香港为两岸学术交流扮演桥梁作用，其他国家与地区无法取代。

〔4〕 参陈三井主编：《走过忧患的岁月——近史所的故事》，台北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5年；《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》，台北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4年。

实与民国史学的走向西方，并无二致。及至 80 年代末期，由于台湾解严，台湾政治渐见自由化与本土化，促成史学风气丕变，此即重视本土的台湾史研究之勃兴，以至于一枝独秀，至今未衰。而中国史研究却由是褪色，实为始料之所未及。

香港一地，自 1949 年后，在英国殖民统治下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。然居民以华人为主，逐渐衍生出华文史学，自成一格。香港虽受英人管治，然英国史学在香港本土未见彰显，只有英治香港殖民地官僚，与本地学者组成之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（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），从事以英语为主的香港及中国史研究。然自 20 年代以降，国内学者许地山（1893—1941）及陈寅恪（1890—1969）相继南下，于香港大学（港大）中文系任教，首开本港华文史学研究的先声。及至 1949 年国内史家相继南移，时钱穆（1895—1990）创办新亚书院及研究所，日后成为香港中文大学（中大）的成员；而罗香林（1906—1978）则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，民国史学由是南移香江。其中尤以秦汉至明清的古史研究最为突出，为香港华文史学奠下基石。而香港新一代史家亦在钱、罗二人之培训及影响下，兼且受教于来港任教的台湾及旅美、旅澳华裔史家，前者如牟润孙、严耕望、全汉昇、李定一、王德昭等，后者如余英时、薛君度、王赓武等，逐渐成长。其中最值得注意者为 1985 年，本土年青的史学教研工作者，组成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，成员大多在本港土生土长，并于港大、中大及其他院校毕业，继而至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澳洲及日本等地深造，其史学技艺遂得以中西结合，而大部分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主。并在历任会长包括陈善伟、杨意龙（1949—1996）、周佳荣、苏维初、梁元生、李金强、黄嫣梨、林启彦、麦劲生等推动下，出版会刊、学报、专刊，召开讲座、研讨会，遂使中国近、现代史研究，成为香港史学界研究的主流。该会并先后出版《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趋势》（香港教育图书公司，1994）及《当代香港史学研究》（香港三联书店，1994），总结其时香港之华文史学，并透露其发展方向，殊堪注意。此后，研究群体相继出现，如 1997 年，香港科技大学成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，出版《通讯》，推动华南研究，崇尚以人类学治史；香港专上院校及神学院师生于 2005 年，组成中国基督教史学会，推

动中国教会史研究，结合神学与历史，另辟蹊径。以浸会大学历史系出版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》为其代表。其范围仍以近代、现代史为主。随着香港于1997年回归祖国，在后殖民时代及全球化强调英语优先的影响下，本港学术界渐趋以英语为学术的“官方语言”，华文史学之教研，出现危机，此际正徘徊于实质为英语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十字路口。何去何从，尚待考验。

1949年前后，国内以清华及燕京等院校为首的毕业生，相继赴美留学，出现一批海外留美华裔史家，凭借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优厚学术资源，吸纳西方史学研究的观点，进而探析国史，出版不少具有原创性的中英文著述，从而大享盛名，较著者为杨联陞（1914—1991）、何炳棣、周策纵（1916—2007）、刘广京（1921—2006）、余英时、许倬云、黄宗智等，各有擅长。唯独余英时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主流——史料学派及史观学派起而批判，进而建言，实为海外学者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重要反思。余氏于1973年返港出任其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，随即获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，继而出版《方以智晚节考》（香港新亚研究所，1973）、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（香港龙门书店，1976）及《历史与思想》（台北：联经出版公司，1976）三书，由是名重士林。继而影响两岸三地之史学教研工作者，由港台以至于中国大陆。

1973年余氏始于九龙农圃道新亚书院旧址之圆亭，以《史学、史家与时代》为题演讲。随即于台湾《幼狮月刊》出版，继而收入其名著《历史与思想》。演讲乃从清代乾嘉考证学与德国兰克史学的遇合，说明民国史坛主流派史料学派的出现，对该派以客观科学方法治史，提出质疑，认为史家撰史与时代具有密切关系，在时代影响下，史家撰史，难逃主观的价值判断，而归结于史料学派重视小题大做的“史考”研究，有必要加以综合而撰写“疏通知远”的通史、专史或断代史的通论著述，借以纠正史料学派的局限性。继而又于1979年台湾之《史学评论》创刊时，撰写《代发刊词》，对史料学派及史观学派，再次提出批判，认为前者考史重“证”遂与时代脱节，后者释史重“疏”却与时代过分结合，均非史学。最终提出二者合则两美，并期盼国史的研究透过分析与综合，以社会学者默顿（Robert K. Marton）

主张的“中距程理论”(the middle-range theory)为目标,不断累积研究成果,最终为建立中国文化独特形态及其发展的过程而建构新图像。余氏之论,不但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主流提出反思,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愿景。

与此同时,两岸三地史学家亦开始对彼此的研究成果,作出介绍,进行交流。较早的著述如出身台湾大学及新亚研究所的章群(1925—2000)及逯耀东(1933—2006)先后撰写三书,对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及演变作出论述;出身华东师范大学、留学美国的王晴佳探讨1949年以来台湾五十年史学的由来与发展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戎笙推介台湾、香港两地的清史研究。^{〔5〕}至1979年中国实行开放与改革,港、台学者遂得以阅读国内大陆学者的著述,并到大陆进行学术交流。至于大陆学者亦得以出访港、台,了解两地史学的研究,以此为基础,进而出访西方国家,对西方的史学及中国学研究,日渐掌握。继而引进、借鉴最终使大陆学者研究,在会通中西下,出现变化。^{〔6〕}此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,逐渐向西方史学及其中国学研究转向,诚如傅衣凌(1911—1988)所说: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系统地介绍和借鉴国外史学研究的理论、观点、方法和手段,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,将会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勃勃生机。”^{〔7〕}至此,两岸三地的史学,日见由前此分途而日趋整合,彼此逐渐产生更多的学术共通话语。由此观之,随着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兴起、发展、转折,最终至今日得见我国史学由分而合,并走向世界。哈佛大学杜维明所倡导的“文化中国”概念,并预期中国文化整合与创新,显然在传统中国学术蔚为大观的史学已见此一契机。在21世纪中国和平崛

〔5〕 章群:《中共早期的历史研究工作》,台北:学海出版社,1990年;逯耀东:《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》,台北:时报文化出版,1979年;《史学危机的呼声》,台北:联经出版,1987年;王晴佳:《台湾史学50年,1950—2000:传承、方法、趋向》,台北:麦田出版,2002年;王戎笙编:《台港清史研究文摘》,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1988年。

〔6〕 罗福惠、田彤:《引进、借鉴、变化——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近现代史学鸟瞰》,《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》,第20期,1995年,第32—47页。并参杨念群:《中层理论——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》,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01年。

〔7〕 傅衣凌:《读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》,《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8年,第188—189页。

起之际，中国史学于中西结合后显然已见坦途，并依此一轨迹前进，其学术研究的荣景已然得见。

李金强

2009年1月

目 录

导 言

20 世纪中国新史学的起承转合 李金强 / 1

新史学的萌生

黄节《黄史》中的世界图像 韩子奇 / 3

胡适史学方法论的形成 江勇振 / 23

章太炎对疑古思潮的批判及其晚年史学思想旨归 陈学然 / 56

朱希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 周佳荣 / 77

钱穆的考信史学

——以钱氏早年的孔子研究为例 林启彦 / 88

新史学的分流

中国文化史的建构

——从《学衡》形成的派别说起 赵雨乐 / 117

台湾专业史学的传承与转折：从帝大到台大(1928—1960)

李东华 / 147

南港学派的创始者

——郭廷以的生平志业及其弟子 李金强 / 172

罗香林早年人种学与民族学的理念与实践 程美宝 / 195

略论白寿彝的民族史思想 瞿林东 / 218

目录系于史学

——论胡文楷编纂女性著作目录之贡献 刘咏聪 / 237

新史学的反思

华人史学在美国

——以刘广京的史学为中心,兼论其他华人史学家 周启荣 / 267

“后现代史学”为名,“西方中心论”为实

——冯客的中国研究背后是什么? 孙隆基 / 285

当代台湾新史学的反思 卢建荣 / 311

世变中的史学

——20世纪中国新史学之回眸的省思 江勇振 / 342

横看成岭侧成峰

——20世纪中国新史学之回眸研讨会记述 王尔敏 / 353

后 记 / 358

新史学的萌生

黄节《黄史》中的世界图像

韩子奇

引言

1918年5月，苏曼殊在上海病逝，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黄节（1873—1935），怀着悲痛的心情匆匆赶往吊祭。在上海，黄节遇上阔别多年的老朋友邓实（1877—？），回想前尘，不禁百感交集，写下一首动人的七言律诗：

国事如斯岂所期，当年与子辨华夷。
数人心力能回变，廿载流光坐致悲。
不反江河仍日下，每闻风雨动吾思。
重逢莫作蹉跎语，正为栖栖在乱离。^{〔1〕}

在这首诗里，黄节除了寄托情怀、感慨年华逝水之外，他念念不忘十多年前与邓实一起编辑《国粹学报》。从1905到1911年，在“数人心力能回变”的信念推动下，他们每月出版《国粹学报》，向文人雅士灌输反清、反帝制、反专制的思想。套用汪精卫的话，《国粹学报》是辛亥革命时期“文学鼓吹”的一个重要渠道。^{〔2〕}正如郑师渠所说，以《国粹学报》为代表的“晚清国粹派”是“一身二任”。他

〔1〕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、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合编：《黄节诗选》，刘斯奋选注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142页。

〔2〕 革命的“文学鼓吹”一词，见汪精卫：《续刊辞》，《民报》（横滨）第25号，1910年1月，第1—4页。

们既是“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翼”，又是“一批精通国学的学者”，对推翻清朝、建立共和，起了积极的作用。^{〔3〕}

但是黄节诗中提到的“当年与子辨华夷”，也导致到辛亥革命后，《国粹学报》很快被视为“文化保守派”的大本营。所谓“辨华夷”，是指包括邓实、黄节、刘师培、章太炎的“晚清国粹派”，对民族主义所抱的立场和态度。^{〔4〕}他们的民族主义是以汉族为中心，认为中国是汉族人的中国，坚决排斥满洲、蒙古、匈奴、鲜卑、契丹、沙陀等异族。他们认为，中国近代的积弱是由于长时期受到异族的统治，汉族人受到无情的压迫，无法施展所长。故此，解救中国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进行民族革命，推翻清政府，建立汉人的政权。从理念到内容，“晚清国粹派”的“大汉民族主义”都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倡的“五族共和”背道而驰，难免给人顽固守旧、落后保守的印象。更重要的，是他们没有切实面对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复杂性，忽略了费孝通所说“多元一体格局”。^{〔5〕}

同时，“晚清国粹派”相信汉族黄种人在远古时代是从西亚细亚迁徙到中国来。对不少学者来说，“晚清国粹派”提倡“西来说”，更显露他们的愚昧和无知，胡乱地把汉人比附巴比伦人。^{〔6〕}他们的愚昧，是不了解“西来说”是“伴随西方帝国主义高度扩张，所产生之‘欧洲中心’（Euro-centric）的文化霸权论述。”^{〔7〕}他们的无知，是

〔3〕 郑师渠：《晚清国粹派——文化思想史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前言，第1页。有关《国粹学报》的革命活动，参阅喻大华《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82—110页。

〔4〕 1935年，章太炎为刚过世的黄节写墓志铭，文中特别强调黄节在编辑《国粹学报》时，曾参与“辨华夷”。原文为：“学既就，直清廷失政，群僉用事，遂走上海，与同学邓实等集‘国学保存会’，搜明、清间禁书数十种，作《国粹学报》，以辨华夷之义。”见黄节：《诗学》，北京：国立北京大学，1935年[1964]，第22b页。

〔5〕 从民族学的角度批评“晚清国粹派”的民族观，见费孝通等著：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，1989年；陈连开：《中华民族研究初探》，北京：知识出版社，1994年。

〔6〕 缪凤林：《中国民族由来论》，《史学杂志》（南京）第2卷第2期，1931年5月，第1—11页；第2卷第3期，1931年5月，第1—10页。方豪：《中西交通史》，台北：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，1954年，第32—36页。罗香林：《中西民族史》，台北：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，1955年，第1—3页。

〔7〕 沈松桥：《我以我血荐轩辕：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》，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》（台北）第28期，1997年12月，第37页。

“〔西来说〕所蕴含的种族偏见与虚构性，在目前考古实证研究的检验下，殆已昭然若揭。”〔8〕

虽然从今天的角度，“晚清国粹派”的“辨华夷”确实是错漏百出，缺乏说服力；但一如黄节诗中所说，“晚清国粹派”的“辨华夷”，背后是受“数人心力能回变”的豪情壮志所驱策。他们之所以“辨华夷”，是要为中国谋出路，希望通过“辨华夷”去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。正因为当日的热血情怀，黄节才会对晚清“新政”和辛亥革命感到失望，慨叹“廿载流光坐致悲”，更把身处的军阀割据时代形容为“正为栖栖在乱离”。

那么，在黄节眼中，20世纪初期的中国究竟是面对什么样的问题？他为什么认为“辨华夷”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方法？他的“大汉民族主义”与“晚清国粹派”提倡国学、宣扬国粹又有什么关系？在晚清新政期间（1901—1911），“辨华夷”、提倡国学、宣扬国粹三者是怎样结合起来，建构一套新的世界图像，帮助中国进入现代的世界系统？

为了解答以上的几个问题，本文尝试从“现代性”（modernity）的角度去探讨“晚清国粹派”的“辨华夷”。所谓“现代性”是指自欧洲工业革命后所产生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。这个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是从15世纪开始萌芽，17、18世纪茁壮成长，到19、20世纪发展至顶峰。这个世界系统首先从欧洲扩展至南北美洲（即所谓“新世界”，New World），然后再扩展至非洲、印度洋地区，最后在19世纪初期慢慢伸展至东南亚和东亚。从内容来说，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包括三个部分：（1）资金的不断增长和在全球范围内流通；（2）商人不断在全球各地开发市场和寻找廉价的生产资源和劳动力；（3）欧洲列强强不断往外扩张，在全球各地建立殖民地，以保障自己的势力。在资金、市场、殖民扩张三者交叉作用之下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、经济、和文化系统。在政治方面，“现代”就是单一的“民族国家”（nation-state）代替了多元和复杂的“帝国”（empire）。在经济方面，“现代”就是市场经济代替了小农经济，全球性的经济贸易网络代替

〔8〕 沈松桥：《我以我血荐轩辕：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》。

了地区性的经济交换关系。在文化方面，“现代”就是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达尔文进化论代替了“周而复始”的循环天命论；“天赋人权”的平等观代替了“理一分殊”的等差社会秩序。^{〔9〕}

一直以来讨论“晚清国粹派”的“辨华夷”，只集中于“大汉民族主义”的弊端，忽略了“辨华夷”是对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回应。本文的目的，是以黄节的《黄史》为例，分析《国粹学报》的两个世界图像：黄种人的“西来”与汉族文化的精髓。前者的目的是把中国纳入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之内，证明从远古开始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、文化网络的一部分。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（nation-state），证明中国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帝国，它是可以被改造为现代的“想象的共同体”（imagined community）。本文的结论是，从“现代性”的角度观察，《黄史》并不像一般所说的顽固守旧、落后保守；它的贡献是给中国进入现代的世界系统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
“时间”与“权势”的矛盾

于1905年，当邓实和黄节出版第一期《国粹学报》时，中国已经被纳入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系统。随着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及租界的设立，外国的资金及产品不断地流入中国市场，而中国的货品和劳工也源源不绝地输出到世界各地。在运输方面，贯通南、北美洲的巴拿马运河即将开凿完成，与贯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，一起成为全球航运网络的重要管道。在政治方面，清政府的“新政”正

〔9〕 有关现代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与发展，参阅 Giovanni Arrighi, *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: Money, Power,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*, London: Verso, 1994; Fernand Braudel, *Civilization & Capitalism 15th-18th Century*, three volumes, 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2; Immanuel Wallerstein, *The World System*, three volumes, New York: Academic Press, 1974-1991。现代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系统与民族国家兴起的关系，参阅 Charles Tilly, *Coercion, Capital, and European States, AD 990-1990*, Oxford: Basil Blackwell, 1990。关于现代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系统为何不断地往外扩张，争取新市场与新生产地，参阅 David Harvey, *Spaces of Hopes*, 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0。